

闲话文人 成健

汪曾祺的鳊鱼



晚年汪曾祺。(资料图片)

汪曾祺是从苏北里下河平原走出来的作家，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，飘散着草屋茅舍上的袅袅炊烟，也飘散着百姓人家饭桌上亲切的热气和香味。

美丽的高邮湖水产丰富，鱼在汪曾祺的生活和记忆里，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重要位置。与汪曾祺交情颇深的苏州作家陆文夫，说起来辈分比汪老头要晚一辈，却气味相投，都属于文人中的酒徒。他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，不谈文学，不谈政治，谈的尽是一些捞鱼摸虾的事，因为他们都是在江河湖泊的水边长大的。而汪曾祺吃过的所有鱼类里，鳊鱼是其最爱之一，能与之相提并论的，在他心目中也只有南方的石斑。

“鳊鱼是非常好吃的。鱼里头，最好吃的，我以为是鳊鱼。”汪曾祺这样说过。

汪曾祺的评论不能说是绝对权威，但却有相当的分量。他对故乡的食物特别是鱼类做过探寻和研究，比如鳊鱼名字的由来，汪氏的阐述令人信服：鳊鱼在里下河一带叫作鲢花鱼，鲢花得名于鬬花。而鬬，即花毯之类，鳊鱼身上的杂色斑点，就好比古代毛毯的花纹。后人因嫌“鬬”字复杂，便写成了鲢花。当然正规的名称还是鳊鱼，也写作桂鱼。

关于鳊鱼的吃法，汪曾祺自然也是如数家珍，最有名的如松鼠鳊鱼、臭鳊鱼，还有清蒸、干烧、糖醋等等，除此而外，他还郑重推荐了白汤鳊鱼：“余汤，汤白如牛乳，浓而不腻，远胜鸡汤鸭汤。”但汪曾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干炸鳊鱼，他回忆起三十年代的往事时写道：“我在淮安吃过干炸鳊花鱼。活鳊鱼，重三斤，加花刀，在大油锅中炸熟，外皮酥脆，鱼肉白嫩，蘸花椒盐吃，极妙！”读汪曾祺描写美食的这些文字，虽不能满足口福，却也是一种十分惬意的享受。

汪曾祺知鱼善吃，他认为鳊鱼非但肉厚，还兼有“细、软、鲜”三个特点，这些妙处集于一身，无疑非常难得。若是数十条鲜活鳊鱼，专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的蒜瓣肉，其余弃而不用，做成一道菜，那可比甲鱼只用裙边还要讲究。汪曾祺在一篇小说里写扬州大盐商宴请新任两淮盐务道大人，摆下一桌很清淡的酒席，菜单上的鳊鱼便是这个做法，毋庸多言，想象一下就已让人感到过于奢侈了。

汪曾祺是一个馋嘴贪吃的老头，这一点他自己也从不讳言，若是见到鲜美如鳊鱼的食材，他头脑里会立马想到如何去吃它，即使是在他的小说里写到鱼鹰捕鱼时，也会冒出这样的念头：“管鹰的把篙子一摆，二十只鱼鹰扑通扑通一齐钻进水里，不大一会，接二连三的上来了。嘴里都叼着一条一尺多长的鳊鱼，鱼尾不停地搏动。没有一只落空。有时两只鱼鹰合抬着一条大鱼。喝！这条大鳊鱼！烧出来以后，哪里去找这样大的鱼盘来盛它呢？”

鳊鱼里面，其实也可分为好多类别，不同类别大小不同，大的可达几十斤，而小的才一斤以下。究竟是大的好吃还是小的好吃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。大多数人认为小的鱼肉细嫩，会挑小的。陆文夫就

曾在文章里说起过，鳊鱼超过一斤便不是上品，不嫩。

但是，吃鳊鱼最重要的选择还不是大小。在一次宴会上，女作家宗璞坐在汪曾祺旁边。席间，服务员端上一道清蒸鳊鱼，鱼有两条，一大一小。桌上众人都先拣大的下手，唯独汪曾祺把筷子伸向了小的。宗璞心细，问其缘由，汪曾祺答道：大的鱼皮是白色，不新鲜；小的鱼皮呈黄色，新鲜。宗璞已经吃过了大的，听此一说便再去尝尝小的，味道果真不一样，确实是小的好。

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吃，其实也是一门必不可少的学问，也能写成脍炙人口的好文章。■

百味书斋 周华诚
篱笆墙上的木槿花

“打禾场应当设在一片高地上，让风可以从它上面吹过。”

读《论农业》，一本朴素的小书。古罗马人M·T·瓦罗著。这样一本小书，在我书桌上，是世界学术名著。在我呢，其实只把它当随笔来读。

书中有，论葡萄的修剪，篱笆和围墙，生产工具（不会说话的），储藏苹果，接枝和插枝，播种紫花苜蓿，干草的收获，打禾场，打谷。还讲到母牛和公牛，狗，斑鸠，鸭子，蜗牛，睡鼠和蜜蜂的喂养。很有意思。

在“拾落穗”一节，瓦罗，这位生于公元前116年的古罗马人郑重地说，如果穗不多，劳力又贵，可以放牲口来吃掉它们。“总之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必须考虑是否有利可图，不要弄得得不偿失。”

比北魏《齐民要术》还要早400年的这本农业操作手册，可谓颇具趣味；连拾落穗这一细节都顾及到，并单独作为一章来写（尽管只有短短三句话）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在收获过后的稻田间拾稻穗，这无聊的事务，令小孩子十分厌烦，却不敢违抗大人的命令。那时要是我知道有《论农业》这么一本书，我会翻到拾落穗这一章，并把它递到父亲面前。要是父亲采纳这位古罗马前辈的意见，放一群鸡到田间来吃，将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。还讲到篱笆。用种植的树，矮林或荆棘，形成活篱笆。以树为界：一块未经圈起来的农庄的边界，如果沿着它的四周栽上树木作为标志，则较为稳妥。否则，“你的奴隶就要跟他们的邻居们争吵，而你的地界只能通过诉讼来决定。”

地界问题，历来敏感，一亩三分地，农民是很在乎的——耕地，菜园，荆棘蔓延，地界往往会模糊。我记得父亲常常对年幼的我说，那块地是我们家的。对，从那棵梧桐树以南。那棵樟树以西。

树是不会走路的。那些树几十年生在老地方，一动不动。所以以树为界，真是好办法。农人们可以放心：树虽然不说话，但做事情靠谱。

菜园子则大多用篱笆来隔断，防鸡鸭和牛羊进入。把杉木砍了，一排排头朝下扎成篱笆，到春天竟倒长出绿枝来。

有的篱笆边上种牵牛花。紫色的牵牛花攀爬恣意，花开恣意，篱笆在整个春天都显得很不正经，不务正业，不修边幅，不落俗套。

二十多年后，我回到乡下，发现昔日惜土如金的农人把土地随便地扔在了那里，长满荒草。他们远走高飞，进城打工，进厂操控机器。他们回村的时候，土地和田埂已经不再重要。菜园也早已荒芜。菜园边上的篱笆却郁郁葱葱。倒植的杉树竟然向上长出一排排的枝条。篱笆上的木槿，竟然开出了一排排的花朵。

木槿的花，你见过没有？重瓣的一种看上去颇有些像牡丹。牡丹国色天香，不

是用漆画在农人的大衣橱上，就是绣在小媳妇的新枕头上。

木槿的花，在盛放之前摘下来，去蕊，清炒或做汤，鲜嫩爽滑，口感极佳——我在江西宜春一家湖南菜馆第一次吃到这种花。似曾相识，倍感亲切。这不是老家篱笆上的木槿么？菜园子篱笆墙上年年都开的木槿呀。花开得汪洋恣意，叫人们看了不知如何是好的木槿。

远离乡村之后，每一次与失散多年的植物久别重逢，竟然大多发生在餐桌上。这真是叫人心生羞愧。

木槿，也有人叫它早芙蓉。木槿可药用。生了脓肿疮疖，在树根上挖取几段根皮，捣烂敷在患处，拔脓消肿，效果很好。年少时，我十分乐意地为乡邻们做这件事。我家有棵大木槿树，我因之十分自豪。

放下《论农业》，翻开《浙江野菜100种精选图谱》，果然看到木槿。从两千年前的农业学术书里流浪而来，不期遇见篱笆上开花的木槿，最后，这样一朵花终于落到了实处——落在了舌尖上，于是，深更半夜的我，感到心满意足。

写完此篇短文一个月，在一本外国人100年前写的书中，又遇到木槿。阿绮波德·立德，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的妻子，跟着丈夫在中国生活了20年，足迹遍及中国南方的通商口岸。在《穿蓝色长袍的国度》中，立德夫人这样记录——

“今天我终于发现了这些农民种木槿的原因。他们去掉木槿花萼，剥开花苞，取出雄蕊做一种清凉解暑的饮料。”

1898年8月19日，一个闷热的夏日，她在日记里写道，“厨子今天真的给我们做了木槿汤，味道相当不错。”■

如歌行板 杨华山
走进清华看荷塘

2017年8月，因为参加海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一个培训班，我有幸踏进了令莘莘学子艳羡的清华大学学习。坐在清华的教室里，聆听知名教授的谆谆教诲，走在清华园内，感受学中骄子的独特魅力，心中充满无限喜悦，似有一种“圆梦”的感觉。

也许是当年上中学时，熟记了朱自清先生《荷塘月色》的缘故，从那时起，清华园那片诗意朦胧的荷塘便勾去了我的魂魄，那片幽深神秘的“夜色”笼罩了我的身心。从踏入清华校门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先生笔下如诗如画的荷塘边。因此，第一天课余，我便迫不及待地走近了这个驻在心中很多年的荷塘。

来到荷塘，我发现荷塘南北长、东西窄，成长形状。站在一端远远望去，左侧



清华荷塘

是一片荷叶区，岸边有朱自清的塑像。塘里的荷花，有的含着花苞，有的已经绽放，或独立枝头，或藏在层层叶片中间，像是举在手里的火炬。为了展示蓬勃的生机，它们总是争着拔高自己的茎干，让宽大的叶子像亭亭华盖一样恣意铺开，你盖着我，我盖着你，鲜艳叠翠。荷塘右侧有一排平房，平房的路边是清一色瀑布一样低垂的柳枝，筑起了荷塘旁绿色的浓荫。池塘那层层叠叠的绿叶，让人产生恬淡清静的心境。由于正值暑假，游客众多，尤

其以青少年为甚。我看到，荷塘两岸，观赏的、漫步的、休息的、照相的，人流如织，热闹非凡。

荷塘的北面，被一众小山小桥亭台垂柳古槐包围着，其间有曲曲折折的小路，让一池繁茂的荷花层次丰富，总给人藏着掖着，意犹未尽的感觉。我走在一座莲桥边，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，看到有小贩在卖一些介绍清华的书籍和一些有关清华的工艺品，工艺品有“荷塘月色”“清华园”“水木清华”等墨迹的纸扇、书法帖子和书签等等。旁边有两个年老的大爷一边看一边嘟哝着什么，一打听，才知道他们是清华退下来的老教授，经常来这里散心解闷，义务为游客讲解清华园的前世今生。于是，我上前搭讪。我们聊起朱自清荷塘月色写作的时间背景，聊起清华因庚子赔款而建校，聊起清华的106年，聊起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校训……他们如数家珍，滔滔不绝。我惊叹这两位老人的健谈，与他们闲聊，你会慢慢感受到清华百年名校的厚重，他们才是做学问懂清华的“真人”。

我踮脚在当年先生“日日走过的荷塘”边，百感交集，思绪万千。朱先生也许没有想到，他这篇精美的散文，成就了一处美丽的风景，甚至变成了清华的一种象征一个品牌。忽然一阵清风拂来，激起一道道追逐的绿色波浪，层层推高。我看见河中“玉盘”顺势摇曳倾摆，花瓣轻舞飞扬，落英缤纷随水游走，有如“流水落花，天上人间”的诗意。

走进清华，看到这铺满新绿风采绮丽的荷塘，朱先生留下的美文，又一次在我的心湖泛起涟漪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，一种生生不息的传承和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风骨。■

收藏小记 徐永鹏
清代同学录

在我收藏的上百本古书中，有一本弥足珍贵的《清代同学录》

清朝末期，中国开始设立“高等学堂”。当时只有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和设在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，该学堂和京师大学堂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，每年招收的学生数量也比较有限，留传下来的学生名录更是寥寥无几。有幸的是，笔者收藏了一份保存完整的清朝宣统年间江南高等学堂同学录，汇刻者为其学生姜澧兰（号廷荣，江苏武进人），住湖北武昌省城军械所。

这本清代同学录，长27厘米，宽16厘米，用白色宣纸印刷，字体为黑色仿宋体，计16页正反（相当于现在的32页）。第一页上是半隶半楷的“同学录”三个大字，外加黑色长框，反面是由四条龙组成的方框图案，竖排两行字“宣统岁在己酉（即1908年距今已有103年历史）仲秋九月印刷”。接着是学堂教授潘任的序言，讲明了刻书的情况和原因。第三页开始是同学录，共有学生223人，其中江苏省147人，安徽省24人，其他省52人，每人分姓名、号、籍贯、住址四项。这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作家、科学家、外交家。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（即今常州市）的中国最盛名的语言学家、词曲家、作家、学者赵元任先生也名列其中。

这本同学录汇集了众多的学生名单，为我们研究清代学堂史大有裨益，可以从中了解学生的分布情况，以及有关名人的学籍。同时，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历史、地理方面的资料，特别是清代末期省的划分、府、州的设置、县的归属等。尤其难得的是，这本同学录不是由校方或官方出资印刷，而是由一位学生出资汇刻，更属难能可贵。■